

再论 2010 年中东剧变的历史背景、特征和影响

黄民兴*

内容提要 中东剧变的历史背景包括以下方面：(1) 本地区的现代化进展迟缓，社会经济方面的发展成效不明显；(2) 政治民主化进展迟缓；(3) 伊斯兰主义组织的发展；(4) 促进舆论开放和政治经济演变的国内外的压力增长。从宏观层面看，剧变的基本特征可以大致归纳为明显的广泛性、自发性、草根性、时代性、非宗教性、不确定性和综合性，尤其是初期。整体来看，中东剧变产生了如下重要影响。第一，对中东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形成的现有国家体系产生了重大威胁。第二，内部政治力量对比的变化，对一些中东国家的政治体制和中央集权产生了程度不同的影响。第三，宗教极端势力的崛起，产生了严重的地缘政治影响。第四，中东国家的经济呈现波动状态，饱受内战折磨的国家则经历了明显的衰退。第五，中东社会受到冲击。第六，中东的地缘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第七，中东剧变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和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

关键词 西亚 北非 中东剧变 中东社会

2010 年末发生的中东^①剧变（西方称“阿拉伯之春”“阿拉伯觉醒”等）对西亚、北非地区形势和世界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有关中东剧变的原因、特征等问题，国内外已经有若干研究。然而，现有不少研究主要关注的是阿拉伯国家本身的问题（如经济发展不足、失业、两极分化、裙带关系、老人政治、民族教派问题等），而对国际因素的研究较少。中东剧变事实上有着相当深刻的历史背景和时代背景。此外，中东剧变发生至今已

* 黄民兴，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

① 本文的“中东”包括西亚和北非地区。

近 10 年, 需要进一步总结, 本文就中东剧变的历史背景、特征和影响再做系统分析。

一 中东剧变的历史背景

1. 本地区的现代化进展迟缓, 社会经济方面的发展成效不明显

尽管中东现代化起步较早, 但有关国家存在程度不同的问题。(1) 经济增长较为缓慢, 特别是非产油国。20 世纪 90 年代, 阿拉伯地区的经济增长率是世界最低的。^① 1984 ~ 1994 年中东每个劳动力人均 GDP 的年增长率更低, 达 -1.1%, 为世界最低。^② (2) 工业化程度较低。1990 年, 西亚北非地区制造业仅占 GDP 的 13%; 在该地区, 只有埃及和土耳其两国的制造业占比较高, 分别为 19% 和 17%。^③ (3) 经济自由化与国际化程度低, 特别是非产油国。中东的资本市场也较为封闭, 这是 1997 年金融危机对该地区影响不大的原因之一。(4) 农矿产品在多数国家的外贸出口中依旧占主导地位。中东地区出口的 60% 是石油和天然气, 非产油国出口则以农矿原料为特色。2006 年, 中东制成品出口在出口总额中的比例仅为 15%, 化石燃料出口占比高达 76%, 位居世界第一。^④ (5) 外资流入少。在世界上, 阿拉伯国家吸收外资最少, 只有石油部门是一个例外。20 世纪 90 年代, 中东北非地区吸引的外资仅占同期世界外资总量的 1.4%。(6) 文盲比例较高。总体而言, 中东国家的识字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7) 人口结构的年轻化。^⑤ 年轻人更容易因为生活和工作问题而走上街头。有阿曼学者在分析“阿曼之春”的原因时说: “在阿曼, 如同其他阿拉伯国家一样, 新一代在一个历史性时刻被动员起来了。”^⑥ (8) 失业

① 肖军正:《西亚北非地区的社会经济改革》,《国际问题研究》2000 年第 3 期。

② Rex Brynen et al., *Beyond the Arab Spring: Authoritarianism and Democratization in the Arab World*,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12, p. 218.

③ 黄民兴:《试析中东现代化的特点》,《西北大学学报》2003 年第 1 期。

④ Rex Brynen et al., *Beyond the Arab Spring: Authoritarianism and Democratization in the Arab World*,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12, p. 222.

⑤ “Youth in the Arab World,” October 24, 2018, https://en.wikipedia.org/wiki/Youth_in_the_Arab_world.

⑥ Said Sultan al Hashimi, “The Omani Spring: Towards the Break of a New Dawn,” *Arab Reform Brief*, Issue 52, 2011.

率高。2009 年,阿拉伯国家的年轻人失业率达到 23%。^①在埃及,15 ~ 29 岁的年轻人失业率为 25%;高中文凭的失业率为 55%,大学文凭的失业率为 31.7%。^②

中东剧变发生前,少数阿拉伯国家的情况实际上有所改善,其中世界经济论坛于 2007 年把突尼斯评为非洲大陆经济竞争力第一的国家,不过该国依然存在各种民生问题。一位突尼斯著名经济学家在 2011 年的一个研讨会上指出:“所谓的突尼斯经济奇迹实际上只是想象出的一种假象。”^③埃及也被认为是发展较快的新兴经济体,但普通民众未享受到实惠,2011 年占总人口 40% 的民众日均生活费低于 2 美元,公务员月薪只有大约 600 元人民币。^④而中产阶级晋升、提高技能和接受更好教育的机会越来越少。^⑤在产油国巴林存在着严重的教派歧视等问题,而利比亚的下层百姓实际收入很低,这两国都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运动。

2. 政治民主化进展迟缓

威权主义是战后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普遍实施的一种政体。它指的首先是国家政体的高度权威性,以现代化为导向。威权主义是各国独立初期移植西方民主政体受挫后逐渐形成的,以实现赶超型现代化为目标,具有历史的合理性。从发展方向看,威权主义的一般趋势是走向民主化。学界普遍认为,威权主义比传统的民主政体和独裁政体,能够更好地描述发展中国家战后面临的独特形势和任务,以及由此产生的新型政体。威权政体的主体一般是有威望、有实力的政治家(人民领袖、民族英雄、国家缔造者和政治精英),这些人通过自己的影响或者通过权威的手段(控制国家机器、政党和军队、警察等国家机器)对国家进行强制、高效的统治。有学者指出,威权主义同时也是一个时间概念,它主要活跃于 19 世纪后半叶和

① Mehran Kamrava, “The Rise and Fall of Ruling Bargains in the Middle East,” in Mehran Kamrava ed., *Beyond the Arab Spring: The Evolving Ruling Bargain in the Middle East*, London: Hurst & Company, 2014, p. 24.

② 马晓霖:《中东乱局:制度设计与发展模式之误》,《人民论坛》2011 年第 9 期。

③ 康新文:《分析:突尼斯革命迎 1 周年 年轻一代看不到希望》,中国新闻网,2011 年 12 月 28 日, <http://www.chinanews.com/gj/2011/12-28/3565229.shtml>。

④ 《埃及迷局》,《商周刊》2011 年第 4 期。

⑤ Rex Brynen et al., *Beyond the Arab Spring: Authoritarianism and Democratization in the Arab World*,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12, p. 227.

20 世纪中期。^①

中东地区的威权主义可以大致分为两个类型。^② 传统威权主义,以君主制国家为代表,包括海湾六国、约旦、摩洛哥等;新威权主义,包括埃及、叙利亚、也门、土耳其(早期)等共和制国家。中东地区普遍存在着威权主义政治,这与当地原有经济发展的落后、部落社会的长期存在、传统文化对集权统治的认可等有关。^③

在海湾地区,传统威权主义以家族制为特征,王室成员把控了内阁主要部门、军队领导权。许多王室成员还积极从事经济活动,跨入了大资产阶级的行列。随着现代化的发展,摩洛哥、科威特、卡塔尔、巴林、阿联酋和沙特阿拉伯也先后成立了议会或协商会议,从而在理论上成为二元君主制国家。另外,相关国家也向非王室贵族和平民开放政府公职,主要是涉及经济事务的部门。但是,各国的大众参与还远不够完善。在科威特,1985年合法选民仅占居民总数的3.5%。^④ 而且,各国议会并不享有真正的立法权,而主要是咨询和通过内阁立法的机构,伊朗、科威特和巴林等国政府甚至以不同借口中止议会活动。除了某些国家某个时期的御用政党外,绝大多数国家不允许成立政党乃至工会等群众团体。这充分说明,尽管王室希望扩大政权的社会基础,特别是希望知识分子、工人和农民以个体融入现存体制,但不允许他们作为有组织的力量参与政治。

不过,摩洛哥和约旦在国家民主化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摩洛哥在哈桑二世时期让反对党进入国会,从而建立了阿拉伯世界最早的基于政党的国会,而穆罕默德六世于2000年上台后开始推行一系列重要改革,包括成立正义与调解委员会处理其父王在位期间侵犯人权的案件以及由国会通过

① 冯秀文:《世界政治史研究中的威权主义及其历史定位》,《世界历史》2005年第2期。

② 关于中东的威权主义,参见 Mehran Kamrava, *The Modern Middle East: A Political History since the First World Wa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王泰:《埃及的政治发展与民主化进程研究(1952—2014)》,人民出版社,2014。

③ 参见 Michael C. Hudson, *Arab Politics: The Search for Legitimacy*,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 91—99; Metin Heper and Raphael Israeli eds., *Islam and Politics in the Modern Middle East*, London and Sydney: Croom Helm, 1984, pp. 22—25; 黄民兴:《试论20世纪中东君主制的变迁》,《西亚非洲》1997年第6期。

④ 刘竞、安维华主编《现代海湾国家政治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第186页。

家庭法提高妇女地位和提高柏柏尔人地位。^① 在约旦，20 世纪 80 年代末以来也进行了一些民主试验。^②

新威权主义国家均为共和制国家，其中既有从民族解放斗争中获得独立的国家如叙利亚、土耳其，也有推翻了君主制的国家如埃及、伊拉克、利比亚。这些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普遍较君主制国家高，因而其政治体制也形成了明显不同于君主制国家的特点。第一，高度集权的一党政治，包括权力集中的执政党领袖、执政党对国家机器的全面控制、家族－部落关系和教派关系对国家机构和军队的广泛渗透、执政党对非执政党和各种社会团体的统合以及对反对势力的严格管制等。第二，军人广泛干政。不少国家的政权均以军队为基础，尤其是叙利亚和伊拉克，埃及和突尼斯的军队作用则在逐步下降。第三，阿拉伯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如政府大力推进国有化、合作化、计划经济和社会福利等。第四，强烈的世俗化政策，包括法律、教育、妇女问题、社会习俗等方面。因此，上述国家的统治集团来自社会中下层（包括军人），他们在执政后推动了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加强了中央集权，但自身也逐渐成为新的权贵，包括官僚和军事精英，政权原有的排他性不断发展，统治变得日趋僵化。

从 20 世纪 70 年代初开始，中东共和制国家首先展开了经济体制的改革，包括经济的自由化、引进外资、促进服务业的发展等；在政治方面也出现松动，如允许成立反对党，90 年代以后开始了非等额的总统选举等。然而，这些改革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原有政治体制，21 世纪初上述国家仍然保持着权力高度集中的特点。

首先，执政党及其领袖仍然牢牢地把持着国家大权。突尼斯的执政党宪政民主联盟盟员的人数据说达到 200 万人，而国家总人口只有 1000 万人。^③

① Marwan Muasher, *The Second Arab Awakening: And the Battle for Pluralism*,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4, p. 110; Mehran Kamrava, "The Rise and Fall of Ruling Bargains in the Middle East," in Mehran Kamrava ed., *Beyond the Arab Spring: The Evolving Ruling Bargain in the Middle East*, London: Hurst & Company, 2014, p. 35.

② Mehran Kamrava, "The Rise and Fall of Ruling Bargains in the Middle East," in Mehran Kamrava ed., *Beyond the Arab Spring: The Evolving Ruling Bargain in the Middle East*, London: Hurst & Company, 2014, p. 35.

③ Mehran Kamrava, "The Rise and Fall of Ruling Bargains in the Middle East," in Mehran Kamrava ed., *Beyond the Arab Spring: The Evolving Ruling Bargain in the Middle East*, London: Hurst & Company, 2014, p. 32.

显然,执政党主导了议会。根据西方学者的一项调查,2010 年埃及、阿尔及利亚、突尼斯、约旦、也门议会选举和公民自由度的等级是 5 级,科威特、摩洛哥为 4 级(共 7 级,其中 1 级最为自由,7 级最不自由)。在埃及 2010 年选举的议会 504 名议员中,执政的民族民主党有 420 人;即使在约旦,同年选举的议会 120 名议员中,保守派也有 103 人。^①非但如此,一些国家的执政者长期执政,如埃及总统穆巴拉克、突尼斯总统本·阿里、也门总统萨利赫在任均超过 20 年甚至达到 30 年,叙利亚、埃及等国还出现政权家族化倾向。西方学者欧文感慨地称中东是“真正的老人王国”。^②此外,埃及(1981 年)和叙利亚(1963 年)等实行了几十年的紧急状态法。

其次,统治者和与其保持密切关系的少数上流人士建立了高度封闭、垄断经济资源的权力核心。20 世纪 80~90 年代,各国推迟了亟须进行的结构调整计划,而经济的开放和结构调整为与当局保持特殊关系的少数人暴富提供了机会。这些人包括高级军官、官僚和商业寡头,他们向国家提供资金,甚至监管国家的发展项目,从而形成与当局的相互依赖关系。例如,穆巴拉克之子贾迈勒的 39 个朋友每人都拥有 10 亿美元的财富,而总统家族的财产有 400 亿~700 亿美元。^③可以说,上述国家的统治阶层相当腐败。

再次,军队、警察和情报机构对公民实行严格控制。在一些国家,警察和情报机构雇员的人数甚至超过了军队。像本·阿里时代的突尼斯,国内人口的 10% 在情报机构工作;而在 20 世纪末的埃及,安全部门的雇员人数在 150 万人左右,是军队人数的 133%。^④显然,维稳的成本巨大。另外,突尼斯和埃及主要依靠警察和安全部门维持秩序,军队相对超脱,其影响力也有所下降,这对以后两国民众运动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最后,政府对反对派、社会团体和媒体的有效统合。政府允许反对派

① Rex Brynen et al., *Beyond the Arab Spring: Authoritarianism and Democratization in the Arab World*,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12, pp. 148, 157, 153.

② Roger Owen, *The Rise and Fall of Arab Presidents for Lif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172.

③ Mehran Kamrava, “The Rise and Fall of Ruling Bargains in the Middle East,” in Mehran Kamrava ed., *Beyond the Arab Spring: The Evolving Ruling Bargain in the Middle East*, London: Hurst & Company, 2014, p. 26.

④ Mehran Kamrava, “The Rise and Fall of Ruling Bargains in the Middle East,” in Mehran Kamrava ed., *Beyond the Arab Spring: The Evolving Ruling Bargain in the Middle East*, London: Hurst & Company, 2014, pp. 30–31.

建立政党，参加议会选举，甚至提出候选人参加总统选举，但政党建立的批准权和生存条件是由政府决定的。这些具有精英特点的政党不动员民众参与政治，在总体上脱离了民众。就公民社会组织而言，政府利用其从事社会服务，如教育、卫生、慈善，但严禁其从政，人权组织经常遭到压制。此外，埃及著名的爱资哈尔清真寺划归宗教基金部管理，其大谢赫由埃及总统任命，突尼斯的宰图纳宗教大学成为与清真寺脱钩的小型大学。政府对媒体的控制使后者失去了舆论监督的能力。^①

上述国家的经济并未获得真正的发展，深刻的内部矛盾无法得到有效化解并继续恶化，从而埋下了动荡的隐患。产油的海湾国家凭借其良好的福利制度保持了社会的相对稳定，但政治和社会经济改革的缺乏同样意味着深层次矛盾的存在。尤其是巴林，逊尼派的王室和精英阶层统治着占人口大多数的什叶派，后者的公民权并不完善，而当局拒绝与什叶派党派合作，导致矛盾无法解决。^②

由此观之，阿拉伯世界的新威权主义无论在经济发展、消除腐败，还是政治转型方面，都是失败的，而该地区的传统威权主义也存在很大问题。

3. 伊斯兰主义组织的发展

当代中东地区受教育阶层和中产阶级的壮大及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使公民的权利、民主意识强化，素质提高，组织性增强。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阿拉伯世界的公民社会组织达到 13 万个，^③ 这些组织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传统的乌里玛、苏菲派教团，^④ 第二类是现代公民社会组织，第三类是集传统与现代于一身的伊斯兰主义组织（以下简称“伊斯兰组织”），其传统性体现在其思想上；其现代性则体现在其他方面：领袖为知识分子，成员主要分布在城市，组织、手段和活动具有现代性。在

① Nadine Sika, "The Arab State and Social Contestation," in Mehran Kamrava ed., *Beyond the Arab Spring: The Evolving Ruling Bargain in the Middle East*, London: Hurst & Company, 2014, pp. 88 - 90.

② Rex Brynen et al., *Beyond the Arab Spring: Authoritarianism and Democratization in the Arab World*,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12, chap. 4.

③ Nadine Sika, "The Arab State and Social Contestation," in Mehran Kamrava ed., *Beyond the Arab Spring: The Evolving Ruling Bargain in the Middle East*, London: Hurst & Company, 2014, p. 89.

④ Marshall G. S. Hodgson, *The Venture of Islam: Conscience and History in a World Civilization*, Vol. 1. 转引自 S. N. 艾森斯塔特《反思现代性》，旷新年、王爱松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第 348 页。

整个中东, 1967 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以后公民社会组织大量涌现, 它们关注妇女、人权、民主等各类问题。苏丹著名的人权学者兼活动家阿卜杜拉希·安-纳依姆认为, 在阿拉伯世界, “70 年代是政治上活跃的公民社会的开端”。^①

事实上, 伊斯兰组织对教育、医疗和慈善事业的大量投入弥补了政府的不足, 其影响日渐上升。在埃及穆巴拉克时期, 穆斯林兄弟会 (以下简称“穆兄会”) 开始大规模向现代公民社会渗透, 到 90 年代中期, 它全面控制了几个最主要的行业协会——医生协会、工程师协会、药剂师协会、科学家协会和律师协会。2005 年, 穆兄会在议会大选中一举获得 88 个议席, 成为拥有 20% 议席的最大反对党。^②

自独立以后, 一些阿拉伯国家的伊斯兰组织与当局曾发生激烈冲突 (如 1954 年纳赛尔政府对穆兄会的镇压、1979 年沙特的麦加禁寺事件、1982 年叙利亚政府对本国穆兄会的镇压、80 年代后期至 90 年代前期阿尔及利亚政府与伊斯兰极端组织的冲突等), 并出现了例如埃及的库特布的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然而, 伊斯兰主义的主流是温和的, 从而与一些国家的政府保持合作关系, 如埃及、约旦、摩洛哥等。2000 ~ 2010 年, 这一趋势更加明显, 伊斯兰组织已经从反政府的潜在政治组织完全转变为适应伊斯兰政府制定的游戏规则“改革主义者”角色。在黎巴嫩和巴勒斯坦, 政治伊斯兰力量参与了政府; 在埃及、约旦、科威特, 它们在议会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议席; 在突尼斯、利比亚、叙利亚, 流亡国外的伊斯兰领导人开始构思更加实际的政治议程。一些评论家把上述趋势称为“后伊斯兰主义”, 即传统的伊斯兰运动采纳了非宗教政党的语言、战略和论战模式。2005 年, 埃及穆兄会在大选中以实用的“自由是方案”代替了传统的“伊斯兰是方案”。同时, 阿拉伯世界的反政府民众运动, 强调的不是宗教和族群, 而是公民性。^③

① Abdullahi An-Naim, “Problems of Dependency: Human Rights Organizations in the Arab World,” *Middle East Report*, Vol. 30, No. 1, 2000.

② 王泰:《埃及的政治发展与民主化进程研究 (1952—2014)》, 人民出版社, 2014, 第 234 页。

③ Abdullah Al-Arian, “Islamist Movements and Arab Spring,” in Mehran Kamrava ed., *Beyond the Arab Spring: The Evolving Ruling Bargain in the Middle East*, London: Hurst & Company, 2014, pp. 106 – 107.

不过，一些国家的政府依然对伊斯兰组织严加防范和镇压。如突尼斯，在 1989 年的选举中，伊斯兰倾向运动获得了 15% 的选票，政府立即逮捕了该组织的 1 万名成员，并把其领导人加努奇流放国外。^① 反恐成为政府镇压伊斯兰组织和其他反对派的有力借口，而镇压为伊斯兰组织赢得了声誉。但在埃及和突尼斯，世俗与宗教的对立仍然十分严重。

4. 促进舆论开放和政治经济演变的国内外的压力增长

第一，信息化时代的来临对中东国家内政产生了广泛影响。其一为新媒体及手机的普及，使得反对派团体迅速涌现，其联络方式和活动更隐蔽和灵活。以 2010 年每 100 个居民的网络普及率来看，巴林为 55.0，埃及为 26.7，约旦为 38.0，利比亚为 14.0，摩洛哥为 49.0，沙特为 41.0，叙利亚为 20.7，突尼斯为 36.8。^② 其二为电视的普及，如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等观点较为自由的卫星电视的发展（2009 年，半岛电视台的收视率达到 58%），^③ 新闻报道冲破了国界的局限，而半岛电视台的支持更加推动了有关国家的抗议运动，增加了国际压力。其三是信息时代私人 and 公共信息隐秘性的缺失。上述情况代表了信息化时代政治生态的重大变化。

第二，全球社会的变革。美国学者约翰·福兰认为，与 20 世纪拥有强大的政党和政治文化的革命运动不同，21 世纪的革命往往以非暴力作为斗争手段，全球的改革家、梦想家和革命者力图由此追求一个更好的世界。这一趋势开始于 1968 年的法国学生运动，之后有 20 世纪 70 年代智利阿连德通过选举追求社会主义的运动，90 年代则体现为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厄瓜多尔的“21 世纪社会主义”和墨西哥的萨帕塔运动，以及兴起于西方的全球正义运动，其特征是和平夺权、更多参与和非意识形态性。例如，埃及的青年活动分子和领导人受到曾经参与过推翻米洛舍维奇的塞尔维亚青年“抵抗”组织的训练，在开罗解放广场的“4 月 6 日运动”的抗议队

① Shadi Hamid, “Political Party Development before and after the Arab Spring,” in Mehran Kamrava ed., *Beyond the Arab Spring: The Evolving Ruling Bargain in the Middle East*, London: Hurst & Company, 2014, pp. 144 – 145.

② Rex Brynen et al., *Beyond the Arab Spring: Authoritarianism and Democratization in the Arab World*,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12, p. 237.

③ Mehran Kamrava, “The Rise and Fall of Ruling Bargains in the Middle East,” in Mehran Kamrava ed., *Beyond the Arab Spring: The Evolving Ruling Bargain in the Middle East*, London: Hurst & Company, 2014, p. 39.

伍中,高举着作为“抵抗”组织标志的紧握的拳头标识。^①美国著名学者沃勒斯坦也指出:“(法国)1968年的精神通过‘阿拉伯之春’和占领运动得以发扬光大。”^②

第三,亚非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近年来,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经济迅速发展,如中国、印度、巴西、土耳其、印尼。但是,阿拉伯世界则鲜有样板,在二十国集团中只有沙特,但它是产油国。埃及虽然也被当作新兴经济体之一,近几十年的经济改革有一定成效,但问题依旧存在。新兴经济体的飞速发展 with 阿拉伯国家的发展迟缓形成对比,引起许多阿拉伯民众的强烈不满。而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形势的恶化,如食品价格的上涨,则进一步促使了阿拉伯地区社会矛盾的白热化。

第四,西方国家的长期宣传和推动。美国一方面支持阿拉伯世界的亲美独裁者;另一方面则鼓吹中东应当实现“民主化”,为此积极施压当地政府,并扶持这些国家的反对派。2002年12月,美国国务院宣布成立“美国-中东伙伴倡议”计划,其目标是促进经济改革的发展,加强公民社会、扩大政治参与、提高妇女权益等。2002~2005年,联邦政府为此拨款2.93亿美元。^③2005~2010年,美国通过国内的各种非政府组织与基金会,培训了不少于1万名埃及网络高手,每年为此投资近2000万美元,2011年更是将相关款额增加了一倍。^④上述举措产生了一定效果。另外,始于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是美国推进“大中东民主”计划的具体行动,它同样对中东剧变产生了重大影响。

2009~2010年,从主观幸福感(SWB)指数看,阿拉伯地区是世界上唯一急剧下降的地区。2006~2012年,埃及、伊拉克、叙利亚、突尼斯、也门是世界上SWB指数偏低的国家。根据在阿拉伯国家进行的一项调查,受访者

① John Foran, “Global Affinities: The New Cultures and Resistance the Arab Spring,” in Mehran Kamrava ed., *Beyond the Arab Spring: The Evolving Ruling Bargain in the Middle East*, London: Hurst & Company, 2014, pp. 50–64.

②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contradictions of the Arab Spring,” Al Jazeera, November 14, 2011, <http://www.aljazeera.com/indepth/opinion/2011/11/20111111101711539134.html>.

③ 白若萌:《美国在阿拉伯世界的民主外交研究》,博士学位论文,西北大学,2013,第54~56页。

④ 《美国是“阿拉伯之春”的背后推手》,新华网引自《光明日报》报道,2013年1月10日,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01/10/c_124210502.htm。

列举了引发中东剧变的三个最主要的原因，占比最高的是反对腐败（64.26%），其次是改善经济形势（63.55%）、要求社会经济正义（57.21%）。^①

综上所述，阿拉伯世界长期以来各种矛盾的积累，导致了社会动荡的频发，尤其是 2000 ~ 2010 年。其间，叙利亚、黎巴嫩、巴林、也门、科威特、沙特、巴勒斯坦、埃及、摩洛哥、突尼斯、约旦等国家和地区均出现了不同规模的街头抗议。在也门，左派和伊斯兰反对派建立了一个联合组织，反对腐败和专制。在科威特，针对选举法的游行爆发。在埃及，2004 年一个名为“够了”（阿拉伯语为“Kefaya”）的组织成立，第一次公开要求穆巴拉克总统下台。不过，多数抗议只是提出社会经济方面的要求，因此得到了政府的容忍和让步。^② 尽管如此，上述抗议活动还是成为 2010 年中东剧变的预演，它同时证明，这场剧变并非一次突如其来的运动。

二 中东剧变的基本特征及其影响

有关中东剧变的结束时间，国内外学术界依然没有定论。从整体情况看，到 2012 年 6 月运动在多数国家已经结束，有关国家的政府通过局部的让步实现了稳定；除利比亚、叙利亚、伊拉克、也门、科威特和巴勒斯坦，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均已中止。^③ 从 2012 年 6 月开始算，中东剧变已经结束将近 8 年了。然而，环顾地区形势，情况依然不容乐观。

从宏观层面看，剧变的基本特征可以大致归纳为以下几点：广泛性、自发性、草根性、时代性、非宗教性、不确定性和综合性^④，尤其是初期更为明显。

① World Bank, “Syrian Central Bank, Syria Ministry of Economy and Planning, and UN-ESCWA,” Cited from The World Bank, *Inequality, Uprisings, and Conflict in the Arab World*, World Bank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Region, MENA Economic Monitor, Washington, D. C. 20433, 2015, pp. 24, 25, 9.

② Nadine Sika, “The Arab State and Social Contestation,” in Mehran Kamrava ed., *Beyond the Arab Spring: The Evolving Ruling Bargain in the Middle East*, London: Hurst & Company, 2014, pp. 91 – 92.

③ “Arab Spring,” October 9, 2015, http://en.wikipedia.org/wiki/Arab_Spring.

④ 参见黄民兴《再论中东剧变的背景、发展阶段和主要特点》，《史学集刊》2016 年第 3 期。

广泛性——卷入中东剧变的国家和地区十分广泛，共有 22 个阿拉伯国家及地区，即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埃及、利比亚、摩洛哥、约旦、也门、伊拉克、叙利亚、阿曼、巴林、科威特、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巴勒斯坦、黎巴嫩、苏丹、毛里塔尼亚、索马里、吉布提和尚未独立的西属撒哈拉。完全没有卷入的阿拉伯国家联盟成员只有科摩罗。考虑到 2011 年南北苏丹的分离，阿拉伯世界确实进入了一个罕见的动荡时期。

自发性——在运动早期发挥重要作用的并非军人、宗教组织和政党等传统的政治力量，而是此前在阿拉伯世界形成的公民组织，以及剧变中新成立的组织，如埃及的“4 月 6 日运动”。比较而言，在各国堪称组织水平最高的伊斯兰党派由于各种原因反而不引人注目。由此，发挥主要作用的是既非旧精英也非伊斯兰党派的所谓“第三种力量”。

草根性——从各国的国内情况看，参加运动的主要是覆盖广泛的社会中下阶层，囊括了学生、工人、小工商业者、白领、宗教人士、贫民等，这说明运动具有较好的群众基础。

时代性——在爆发运动的多数国家，民众广泛利用了社交媒体作为组织、联络和宣传的手段，因而中东剧变有“脸书革命”之说。^①在经济比较落后的利比亚和也门，手机、网络、视频剪辑也成为主要的手段。^②另外，当局也有利用社交媒体动员支持力量，甚至连恐怖组织也熟练地运用社交媒体。

非宗教性——主要包括世俗派，其组织松散，人数有限，缺乏资金、经验和具有威望的领导人，与民众的联系也较少。所以，阿拉伯各国的示威抗议活动一般表现出零星性、分散性和非意识形态性。不过，在多数国家，世俗反对派最终让位于势力强大的宗教反对派及旧精英。

不确定性——尽管各国运动最初的口号具有类似性，但国情、反对派组织、精英力量等的不同，决定了有关国家运动走向的多样性，不存在单一的发展路径和归宿。

综合性——运动爆发的原因既有阿拉伯国家本身的各种问题即国内因

① See Rex Brynen et al., *Beyond the Arab Spring: Authoritarianism and Democratization in the Arab World*,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12, Chap. 11.

② “Social Media and the Arab Spring,” March 3, 2019,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ocial_media_and_the_Arab_Spring.

素（如经济发展不足、失业、两极分化、裙带关系、老人政治、民族教派问题、环境问题），也有国际因素（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国际粮价上涨等）。

整体来看，中东剧变产生了如下重要影响。

第一，对中东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形成的现有国家体系产生了重大威胁。

这可以分为两个方面，首先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英法签署的《赛克斯 - 皮科协定》确立的中东国家体系几乎崩溃。《赛克斯 - 皮科协定》确定了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和外约旦的边界，上述委任统治地在一战后逐步形成了现代民族国家（巴勒斯坦在分治后形成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地区）。虽然此后经历了种种动荡，但上述国家基本保持了边界的稳定和内部统一，只有黎巴嫩在 1975 年内战后一度经历痛苦的分裂，伊拉克北方的库尔德地区则在海湾战争后实现了事实上的自治。然而，中东剧变对现代中东的国家体系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在伊拉克，2003 年萨达姆政权被推翻后，美国在此建立了由什叶派操控的新政权，逊尼派势力受到遏制，2004 年临时宪法则以联邦制代替了原有的单一制。由此，逊尼派主导的反美运动不断发展，其中极端主义的“基地”组织分支发挥了重要作用。2011 年 5 月，阿布·巴克尔·巴格达迪成为该分支的领导人，正式打出“伊拉克伊斯兰国”的旗号。叙利亚爆发内战后，巴格达迪派遣一支武装赴叙参战，其影响不断扩大。2013 年 4 月，巴格达迪宣布成立“伊拉克和大叙利亚伊斯兰国”（ISIS），在伊拉克北方夺取大片土地。在叙利亚，内战导致国土四分五裂，形成了一场包括了国内外不同力量的两军对垒：一方是叙利亚政府军、伊朗特种部队、黎巴嫩真主党部队，得到俄罗斯的支持；另一方是反对派、“伊斯兰国”，得到土耳其、沙特和西方的支持、纵容。得到西方支持的库尔德武装相对中立。在伊拉克，国土也分裂为政府军、库尔德人和“伊斯兰国”控制区三大区域。而且，装备精良的“伊斯兰国”军队拥有充足的经费、来自海外的兵源，加上逊尼派国家和西方的暗中纵容，叙利亚和伊拉克两国面临着严峻形势，国土的完整性受到真正的威胁。

除了上述两国，地处“赛克斯 - 皮科协定”体系之外的利比亚和也门两国也陷入四分五裂的境地。在利比亚，卡扎菲政权被推翻后，当地的社会经济状况急剧恶化，失业猛增，不少年轻人加入了武装组织。极端武装

在反对卡扎菲的战斗中势力迅速壮大,而伊斯兰势力与世俗派的矛盾也持续发展。虽然 2012 年 7 月选举产生的国民大会(制宪议会)和平接管权力并任命了临时政府,但从 2014 年 7 月开始,各派武装的冲突持续不断,利比亚的局势可以概括为“一个国家、两个政权、三类武装”。两个政权即以图卜鲁格为基地的世俗派(国民大会)政权和以的黎波里为基地的伊斯兰政权;三类武装分别是属于世俗派政权的“尊严行动”,属于伊斯兰派政权的“利比亚黎明”,以及以“伊斯兰国”、“基地”组织和“安萨尔旅”为代表的恐怖与极端组织。^① 2015 年 12 月,世俗派与伊斯兰派经联合国协调,建立民族团结政府总理委员会。2016 年初,总理委员会两次向国民大会提交民族团结政府名单草案,但因两派意见分歧均遭否决。利比亚的统一遥遥无期。

在也门,2011 年 11 月,担任总统长达 22 年的萨利赫同意把权力移交副总统哈迪,后者在 2012 年 2 月举行的总统选举中胜出。2013 年 3 月,全国对话会议启动。然而,萨利赫不甘心退出政坛,什叶派胡塞武装也因为未参与政治谈判十分不满。从 2013 年 8 月开始,也门局势日趋恶化。2015 年初,胡塞组织占领首都萨那,控制国内大部分地区。3 月,哈迪总统被迫流亡沙特,也门因此形成了相互对立的两大阵营: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萨利赫部队对抗沙特、埃及等支持的哈迪总统和政府军。2015 年 3 月 26 日起,沙特、埃及、摩洛哥、约旦等 10 国发动军事行动;9 月,联军发动地面进攻,战局发生有利于哈迪政府的重大转折。此后,也门冲突陷入僵局,国内形成政府军、胡塞组织和“基地”组织三足鼎立之势,分裂困局趋于长期化。在联合国斡旋下,也门各派举行了多轮和谈,但进展迟缓。

综上所述,中东剧变对叙利亚、伊拉克、利比亚和也门的国家稳定产生了严重威胁,上述四国先后陷入了政治动荡、分裂和内战。好在俄罗斯和西方的军事干预沉重打击了“伊斯兰国”的势力,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局势明显好转,也门对立双方也开始尝试艰难的政治解决。

至于其他国家,其政府一般采取了改组内阁、举行市政选举(沙特)

① 唐见端:《利比亚为何成极端势力新温床》,新华网,2015 年 12 月 23 日,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12/23/c_128557801.htm.

及改善民生的措施。步伐较大的有阿曼和摩洛哥。阿曼修改了基本法，赋予协商会议更大权力，并实现了协商会议主席、副主席由该机构议员直选。^① 摩洛哥则于 2011 年 7 月举行全民公投，以 98.49% 的赞成票通过新宪法草案，其中对王权进行了限制，同时扩大了行政和立法机构，尤其是众议院的权力。草案同时强调司法独立。^② 约旦也提出了改革主张，但未能落实。^③

第二，内部政治力量对比的变化，对一些中东国家的政治体制和中央集权产生了程度不同的影响。

在政治力量对比方面，首先是世俗势力与伊斯兰势力的兴衰变化。中东剧变后，随着新的政党法和选举法的颁布，一些国家的新兴党派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而伊斯兰政党也从最初的沉默变为积极参政，崛起为埃及、摩洛哥、科威特、约旦等国的议会第一大党，并试图模仿土耳其的正义与发展党控制政权。此外，还有一些国家成立了相对保守的萨拉菲派政党。

整体来看，上述国家的各党派在议会中都无法提出鲜明的政纲和具体的政策，而伊斯兰政党提出的宗教议题，成为议会辩论的核心议题。在突尼斯，“茉莉花革命”后成立了由三党组建的联合政府，作为第一大执政党的伊斯兰政党复兴运动在讨论新宪法时，要求把沙里亚（伊斯兰教法）作为立法来源，但遭到其他政党的反对。^④ 在埃及，新成立的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控制了政权，之后组建了五人宪法学者委员会。该委员会起草的文件保留了旧政权的宪法中涉及伊斯兰教法是国家的主要立法来源的条款，因而引发了世俗党派与伊斯兰党派的严重对立。在同年 12 月的议会选举中，伊斯兰政党获得 65% 的选票。^⑤ 在议会中，穆兄会的自由与正义党和萨拉菲

① 《阿曼苏丹国国家概况》，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2015 年 7 月，http://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6259/1206x0_676261/。

② 参见《摩洛哥国王放弃部分重要权力 宪政改革迈出重要一步》，人民网，2011 年 7 月 2 日，http://www.people.com.cn/h/2011/0702/c25408_3210174859.html?prolongation=1；“Arab Spring,” October 9, 2015, http://en.wikipedia.org/wiki/Arab_Spring。

③ Rex Brynen et al., *Beyond the Arab Spring: Authoritarianism and Democratization in the Arab World*,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12, pp. 186–187.

④ Abdullah Al-Arian, “Islamic Movements and Arab Spring,” in Mehran Kamrava ed., *Beyond the Arab Spring: The Evolving Ruling Bargain in the Middle East*, London: Hurst & Company, 2014, pp. 118–119.

⑤ 法新社开罗 2011 年 12 月 4 日电。

派的光明党共获得超过73%的议席。^①2012年6月,自由与正义党的穆尔西成功当选埃及第一位民选总统。^②在卡扎菲倒台后的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宣布新国家的基础为伊斯兰原则。

不过,伊斯兰党派尽管在中东剧变前的社会活动中积累了不少的人气,但还是缺乏实际的施政经验。何况,那时的伊斯兰组织已经失去了以往对政治动员的垄断,甚至有时还面临民众的反对。在埃及,穆兄会的一些表现及其宗教倾向,以及穆尔西总统的专断等均削弱了其自身和自由与正义党的威信。^③民众开始进行反政府的示威。2013年7月,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解除穆尔西的总统职务,之后对穆兄会进行了无情的镇压,埃及重回军人执政的年代。

在突尼斯,2014年1月,复兴运动主持的内阁宣布辞职。同时,突尼斯制宪议会否决了包括规定“伊斯兰教为立法主要来源”等在内的部分提案。^④10月举行的新的议会选举宣告了过渡期的结束,由世俗党派联合组建的呼声党一跃成为议会第一大党。

政治力量对比的第二个变化是少数族群的崛起及其对个别中东国家现有体制带来的挑战。由于长期遭受歧视(如叙利亚的部分库尔德人无法享受公民待遇),一些阿拉伯国家的少数族群积极投身于中东剧变,力图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如突尼斯的犹太人、利比亚的柏柏尔人和苏丹的达尔富尔人,^⑤而库尔德人尤其突出。在伊拉克北方,库尔德地区早就实现了自治,并建立了地方政府和武装。2017年9月25日,库尔德自治区不顾中央政府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举行有关独立问题的公投。27日,公投结果宣布,支持独立的一方获胜。虽然公投不具备法律效力,但库尔德自治区主席巴

① Abdullah Al-Arian, “Islamic Movements and Arab Spring,” in Mehran Kamrava ed., *Beyond the Arab Spring: The Evolving Ruling Bargain in the Middle East*, London: Hurst & Company, 2014, p. 121.

② 关于埃及过渡时期的政治博弈和法律斗争, 详见 Said Amir Arjomand, “Revolution and Constitution in the Arab World, 2011–12,” in Mehran Kamrava ed., *Beyond the Arab Spring: The Evolving Ruling Bargain in the Middle East*, London: Hurst & Company, 2014, pp. 170–181.

③ Jocelyne Cesari, *The Awakening of Muslim Democracy: Religion, Modernity, and the Stat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 219–220.

④ 《突尼斯制宪议会完成新宪法草案 历时近三年》, 国际在线, 2014年1月24日, <http://gb.cri.cn/42071/2014/01/24/6651s4402922.htm>。

⑤ “Arab Spring,” December 31, 2015, http://en.wikipedia.org/wiki/Arab_Spring.

尔扎尼依然要求中央与库区就独立问题展开“严肃对话”。不过，中央政府未予理会，同时与周边的伊朗、土耳其政府达成了共同遏制库尔德地区独立的共识。同年 10 月，中央政府调动政府军进入原为中央政府掌控、2003 年伊拉克战争期间被库尔德武装夺取的基尔库克地区，库尔德武装未抵抗。10 月 24 日，库尔德自治区政府发表声明，表示愿意“冻结”公投结果并与中央政府开启对话，从而意味着伊拉克库尔德独立运动暂告中止。

在叙利亚，中东剧变开始后，一直比较稳定的当地库尔德人开始进行示威游行，库尔德民主联盟党进而建立武装、驱逐政府机构和军队、建立事实上的自治区，同时与土耳其的库尔德工人党保持密切联系。2012 年 7 月，各库尔德组织联合成立“叙利亚库尔德最高委员会”。2013 年 7 月，成立了民主联盟党领导的自治政府；2014 年 1 月颁布“临时宪法”（“罗贾瓦宪法”），其中规定自治区是叙利亚的“有机组成部分”。^①同时，民主联盟党把自治区的指导原则从库尔德人独立变为多民族自治。他们还邀请叙利亚的其他地区加入自治区，组建联邦国家。2015 年 12 月，“叙利亚民主委员会”在哈塞克省成立，它成为自治区的政治联盟组织，其成员来自执政党派、议会各党派、无党派人士，包括了多个民族及宗教集团。^②2016 年 3 月，库尔德组织联盟“民主变革运动”宣布成立“北叙利亚－罗贾瓦联邦区”，坚持多元化的自治区设想。^③12 月 28 日，作为自治区政府的“叙利亚民主委员会”通过了新法案，将自治区的名称改为“北叙利亚民主联邦体”，包括 4 个州。由此，与伊拉克不同，叙利亚的库尔德地区建立的是多民族、多宗教的自治，不谋求与其他两个邻国库尔德地区的合并。由于库尔德武装是打败“伊斯兰国”的重要力量，自治区囊括了大片土地，并得到美国的支持和俄罗斯的同情，它对未来叙利亚政府的体制构成挑战。

第三，极端势力的崛起，产生了严重的地缘政治影响。

中东的宗教政治组织分为两类。一类是以民族国家为基础、通过合法或非法的手段致力于本国体制变革的政党和组织，如埃及的穆兄会、黎巴

① “Democratic Confederalism in Kurdistan,” <http://libcom.org/news/democratic-confederalism-kurdistan-25042016>.

② “Syrian Democratic Council,” last modified on January 19, 2017,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yrian_Democratic_Council.

③ “Rojava,” January 20, 2017, <https://en.wikipedia.org/wiki/Rojava>.

嫩真主党、巴勒斯坦的哈马斯等；另一类是致力于在包括中东地区在内的全世界以暴力推翻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和西方式的民族国家、建立伊斯兰国家的组织，例如“基地”组织。2001年的“9·11”事件后，“基地”组织遭到美国的沉重打击，其成员大幅度减少，活动局限于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也门等少数国家。如果说“基地”组织属于第二类组织的1.0版本的话，那么中东剧变后产生的“伊斯兰国”则属于这类组织的2.0版本了。

巴格达迪的“伊斯兰国”^①成立于2014年6月，具有以下几个特征：(1)正式的“领土”。其从叙利亚北部的阿勒颇省一直扩展到伊拉克东部的迪亚拉省，控制土地超过10万平方公里(2014年)，人口达1100万人。^②巴格达迪还自命为“哈里发”，要求全世界的穆斯林效忠。(2)正式的“政府机构”。“伊斯兰国”保留了其占领地区的政府机构和服务设施(医院等)及其人员，有关部门专司外交、文教、矿产资源、工业和公关等领域；其“政府”拥有收入，如油田、税收、世界各地的捐献、文物走私所得等。(3)“军队”。其拥有“军队”以及从战场上缴获的大量精良装备和充足的弹药，战斗力强。(4)强大的宣传手段和先进的人员招募能力。“伊斯兰国”擅长于利用各种新媒体进行煽动性宣传，从伊斯兰世界和西方国家招募战斗人员和其他人员。(5)拥有海外“行省”。如在利比亚的3省、阿尔及利亚省、西奈省、也门各省、呼罗珊省、西非省、北高加索省，以及东南亚地区等，在这些地方均有一些组织宣布效忠，而阿富汗、沙特阿拉伯、黎巴嫩、约旦、乌兹别克斯坦、尼日利亚的某些组织也宣布效忠。

第四，中东国家的经济呈现波动状态，饱受内战折磨的国家则经历了明显的衰退。

影响中东国家经济的原因既有国内的政治动荡和内战，也有世界经济形势(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市场低迷)和油价的波动等。2013~2017年

① 关于“伊斯兰国”，参见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多哈研究中心访问学者、曾任伦敦HIS简氏公司恐怖主义与叛乱中心中东与北非地区主任查尔斯利斯特的新作《“伊斯兰国”简论》，姜奕晖译，中信出版社，2015；方金英：《穆斯林激进主义：历史与现实：政治伊斯兰与国际安全研究》，时事出版社，2015，第三、六章；William McCants, *The ISIS Apocalypse: The History, Strategy, and Doomsday Vision of the Islamic Stat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015。

② 丛培影：《行将覆灭的“伊斯兰国”影响仍然不容忽视》，2017年10月30日，<http://mini.eastday.com/a/171030111909808.html>。

西亚北非国家实际 GDP 的年增长率（见表 1）从 2.2% 预计稳步上升到 4.6%，但不同地区和国家差别很大。其中，第一组海合会成员国整体处于波动中的停滞状态。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为增长，其他成员国均为下降，这与世界市场油价低迷及其他因素（也门内战、卡塔尔断交事件等）有关。第二组发展中的产油国 2013 年的增长率平均为 -0.5%，2014 年转为增长，2016 年后预计迅速增长。其中，发生内战的利比亚、叙利亚、也门和伊拉克均程度不同地有连续衰退、停滞的经历。2017 年，利比亚的 GDP 有所恢复。由此可见，叙利亚内战导致其经济严重倒退，而利比亚的恢复与其石油生产复苏有关。发展中的产油国 2016 年后预计的整体迅速增长实际上是在前期大幅倒退的基础上的恢复，而同期伊朗的增长是美国解除制裁的后果。第三组石油进口国整体在小幅波动中增长，但各国情况也不同。政治相对稳定的吉布提、约旦、埃及和黎巴嫩经济稳定增长，突尼斯和巴勒斯坦在波动中增长，摩洛哥在反复中下降。

表 1 2013 ~ 2017 年西亚北非国家实际 GDP 的增长率

单位：%

国家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西亚北非国家	2.2	2.8	2.8	4.4	4.6
海合会成员国	3.4	3.9	3.2	3.2	3.4
巴林	5.3	4.8	2.7	2.4	2.4
科威特	0.8	0.1	0.2	2.5	2.7
阿曼	3.9	4.1	3.7	3.2	3.5
卡塔尔	6.3	6.2	6.6	6.8	5.9
沙特阿拉伯	2.7	3.6	2.8	2.4	2.9
阿联酋	4.3	4.6	3.0	3.1	3.3
发展中的产油国	-0.5	0.9	1.3	7.2	7.0
利比亚	-13.6	-24.0	2.9	34.8	16.6
也门	4.8	-0.2	—	—	—
阿尔及利亚	2.8	4.3	2.8	3.9	4.0
伊朗	-1.9	4.3	1.7	6.1	6.8
伊拉克	8.4	-2.4	0.5	3.1	7.0
叙利亚	-20.6	-18.0	-15.8	10.1	10.4

续表

国家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石油进口国	2.7	2.3	3.5	3.6	4.2
埃及	2.1	2.2	4.2	4.6	4.9
突尼斯	2.3	2.3	0.8	2.8	3.7
吉布提	5.0	6.0	6.5	7.0	7.1
约旦	2.8	3.1	2.5	3.7	4.0
黎巴嫩	0.9	2.0	2.0	2.5	2.5
摩洛哥	4.4	2.6	4.7	2.7	4.0
巴勒斯坦	2.7	-0.3	3.0	3.9	3.7

注：2015 年为估计值；2016、2017 年为预测值。资料来源：World Bank, Syrian Central Bank, Syria Ministry of Economy and Planning, and UN-ESCWA, Cited from The World Bank, *Inequality, Uprisings, and Conflict in the Arab World*, World Bank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Region, MENA Economic Monitor, Washington D. C. 20433, 2015, p. 9.

对上述国家的财政情况做进一步分析可知：2014 年，表 1 中的西亚北非国家的预算整体出现赤字并一直延续到 2017 年。就三个分组来说，2013~2014 年，海合会成员国整体的预算盈余从占 GDP 的 10.4% 减少到 2.3%，2015~2017 年则预计连续 3 年出现赤字（分别占 GDP 的 -9.4%、-6.0%、-5.1%），不存在赤字的只有科威特和阿联酋两国；发展中的产油国同期整体而言全部是赤字（5 年的同一比例分别为 -3.1%、-5.8%、-10.3%、-5.0%、-1.9%），只有利比亚在 2016~2017 年预计出现盈余；石油进口国这 5 年也全部是赤字（5 年的同一比例分别为 -8.9%、-7.5%、-7.9%、-6.5%、-5.9%），而且所有国家无一例外，埃及、巴勒斯坦和黎巴嫩的情况尤其严重。另外，上述石油进口国全部存在外贸逆差。^①

下面以叙利亚为例来说明内战对有关国家经济的影响，“伊斯兰国”对其大片国土（其中分布着油田）的占领和战乱的其他影响（如大批难民出逃）无疑是巨大的。2011~2013 年，叙利亚生产的 21 种主要农产品中，有 15 种的产量出现下降，包括小麦、玉米、土豆、甜菜、橄榄、西红柿等，其中前 4 种的产量在 2013 年分别只有 2011 年的 82.5%、36.6%、61.8% 和

① 2015 年为估计值；2016 年、2017 年为预测值。见 The World Bank, *Inequality, Uprisings, and Conflict in the Arab World*, World Bank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Region, MENA Economic Monitor, Washington D. C. 20433, 2015, p. 9.

17.6%。在农业方面,牲畜头数总体上变化不大,或略有下降,但一些农产品的下降较为明显。2013 年,鸡肉、牛奶、鸡蛋的产量只有 2011 年的 60.1%、89.8%、71.2%。渔业的损失比较大,捕获鱼和养殖鱼的产量在 2013 年分别只有 2011 年的 81.4%、53.3%。采矿业更是如此,硫磺矿、粗盐、石膏、天然气和石油的产量在 2012 年分别只有剧变开始前的 2010 年的 48.4%、42%、60.7%、64.3% 和 44.5%,而石油对叙利亚的国际收支具有重要意义。工业方面的情况参差不齐,与 2011 年相比,2013 年胶合板、纸和纸板的产量没有变化,橄榄油、棉籽油稍有下降,而水泥、豆油、汽油、馏分油和渣油的产量分别只有 2011 年的 66.7%、20.3%、77.2%、68.2% 和 59.4%。此外,叙利亚的外贸出口从 2010 年的 5690.64 亿叙利亚镑猛降到 2013 年的 1964.52 亿叙利亚镑。^① 根据总部设在大马士革的非政府组织叙利亚政策研究中心(SCPR)于 2016 年 2 月发布的数字,内战给叙利亚造成的经济损失达到 2550 亿美元。^②

另外,动荡的地区形势对外资流入和旅游业都产生了负面影响。例如 2011 年,到黎巴嫩旅游的外国游客为 165.51 万人,2013 年下降为 127.44 万人。^③

第五,中东社会受到冲击。

首先,中东剧变对中东国家少数民族的地位产生重大影响。如前所述,一些国家的少数民族在中东剧变中表现活跃,但因为各种原因,也有一些国家的少数民族面临着不同问题,如埃及的科普特人和利比亚的基督教社团就遭遇了程度不同的虐待事件。^④ 上述国家的基督徒因此加快了向海外的移民。在伊拉克,雅兹迪教徒、基督教徒、土库曼人等少数民族遭到“伊斯兰国”的迫害,甚至人身安全受到威胁。

① Europa Publications,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2016*, 62nd edition., Abing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pp. 1054 – 1055, 1057.

② “Report on Syria Conflict Finds 11.5% of Population Killed or Injured,” February 11, 2016,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6/feb/11/report-on-syria-conflict-finds-115-of-population-killed-or-injured>.

③ Europa Publications,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2016*, 62nd edition., Abing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p. 721.

④ Lt. Colonel János Besenyő, “Arab Spring, Christian Fall? – The Situation of Christian Minorities in the Middle East after the Arab Spring,” Geoinformation Service of the Hungarian Defence Forces and Roland Gömöri, University of Szeged, June 2013.

另外,一些国家的政府对少数民族事务表现出了更多的关心。在叙利亚,2011 年 3 月,政府设立专门委员会,负责解决 1962 年人口普查造成的无国籍库尔德人问题。4 月 7 日,总统巴沙尔决定给予登记在册的“外国人”以叙利亚国籍。^①叙利亚政府同时宣布,从 2012 年开始把库尔德新年作为公共节日庆祝。在摩洛哥,2011 年新宪法规定把柏柏尔人的语言和阿拉伯语并列为官方语言。

其次是妇女地位的变迁。在爆发抗议活动的所有阿拉伯国家,各个阶层、教派和不同年龄的妇女都积极参加了,尤其是在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她们成为示威的组织者和参与者,通过写作网络文章、通讯报道及传送视频等推动运动的发展。在一些街区,妇女自发地组织起巡逻队,维护地方治安。此外,在新媒体使用方面,妇女比那些不那么会用新媒体的上了年纪的男性具有优势。在一些阿拉伯国家还涌现出一批杰出的女性活动家。在埃及,女权主义作家纳瓦勒·萨达维重建了穆巴拉克时期被禁的埃及妇女联合会。在也门,妇女活动家塔瓦库·卡曼由于在组织示威和学生集会方面的突出贡献,被誉为“革命之母”。在利比亚,阿拉娅·穆拉比特创建了“利比亚妇女之声”组织,致力于反对性暴力和提高妇女的经济、政治地位。^②

中东妇女在剧变中一方面踊跃参与一般的抗议活动,另一方面也努力推动提高自身地位,有时得到了政府的支持。2012 年,埃及议会 498 个席位中有 12 席为女性,而 2013 年制宪议会中女性的比例增加到 6%。此外,埃及也兴起了名为“拒绝军事法庭”的反对军人羞辱女性的运动,最终推动政府通过了惩罚性骚扰的立法。此举遏制了埃及性骚扰现象的出现,也鼓励妇女大胆地举报类似行为。据报道,2013 年埃及有 15 例性骚扰案件进入了司法程序。在突尼斯,2012 年选举结束后,妇女在制宪议会 217 个席位中占有 61 席的高比例。同时,突尼斯妇女在离婚和子女监护方面的权利也扩大了,政府还废止了多妻制。在沙特,2015 年妇女获得了投票权,多位女士进入政府任职,国王还任命了 30 位女士进入协商会议。^③

① 唐志超:《“阿拉伯之春”背景下的库尔德问题新动向》,《和平与发展》2013 年第 3 期。

② “Women in the Arab Spring,” February 15, 2019, https://en.wikipedia.org/wiki/Women_in_the_Arab_Spring.

③ “Women in the Arab Spring,” February 15, 2019, https://en.wikipedia.org/wiki/Women_in_the_Arab_Spring.

最后是难民危机的影响。“二战”后，中东地区的一系列地区危机产生了大批难民，他们来自巴勒斯坦、阿富汗、伊拉克等亚洲国家和索马里、苏丹等非洲国家。中东剧变开始后，难民的人数大幅度增长，来自叙利亚、伊拉克、也门和利比亚等多个国家。到 2017 年底，叙利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难民输出国，进入其他国家的叙利亚难民超过 630 万人，分布在世界 125 个国家，其中中东国家主要有土耳其（3424200 人）、黎巴嫩（992100 人）、约旦（653000 人）、伊拉克（247100 人）、埃及（126700 人）。2017 年底，土耳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难民输入国，境内外籍难民达到 350 万人，其中主要来自叙利亚（3424200 人）、伊拉克（37300 人）、伊朗（8300 人）、阿富汗（5600 人）。黎巴嫩是中东第二大难民输入国，境内有外籍难民 998900 人，其中主要来自叙利亚（992100 人）、伊拉克（5700 人）。伊朗境内有外籍难民 979400 人，其中主要来自阿富汗（951100 人）、伊拉克（28300 人）。约旦境内有外籍难民 691000 人，其中主要来自叙利亚（653000 人）、伊拉克（34000 人）。^① 上述外籍难民的存在对所在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稳定具有潜在影响。

第六，中东的地缘格局发生重大变化。

中东剧变开始前，中东的地缘格局可以概况为以下特点：亲西方的君主制国家（出产石油的海合会国家与不生产石油的约旦、摩洛哥）与亲西方的共和制国家（埃及、突尼斯）联合，形成非正式的联盟，维持中东局势的稳定，应对敌视西方的叙利亚和伊朗。上述亲西方的集团与本地区非阿拉伯的亲西方国家土耳其、以色列保持着一种微妙的关系。另外，美国的奥巴马政府奉行“撤出中东”的政策，完成从伊拉克撤军，并致力于推进与伊朗的核问题谈判。从整个地区形势看，中东国家努力应对 2003 年伊拉克战争后新的格局变化，而伊朗乘机扩大自身在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真主党）和也门（胡塞武装组织）的影响，形成了从伊朗经伊拉克到叙利亚、黎巴嫩的所谓“什叶派新月”，加上其对半岛南部的也门的影响，对沙特构成南北包抄的局面。兼以美国的伊核政策及页岩气开发对石油市场和油价的冲击，沙特感受到威胁，以色列同样因为上述原因和美国对以色列定居点政策的不满而与奥巴马政府关系紧张。另外，

^① UNHCR, *Global Trends: Forced Displacement in 2017*, Geneva, 2018, pp. 14, 17–18.

俄罗斯在这一时期不断加强其在中东的影响,尤其是向伊朗出售武器和核电站设备,并向叙利亚出售武器,参与巴以问题的解决,发展与海湾国家、土耳其、埃及的贸易,与沙特协商油价问题。总之,2003~2010 年伊拉克战争后的中东局势处于过渡阶段,美国在中东的影响下降,其传统盟国与美国关系出现裂隙,而伊朗、土耳其充分利用新的形势扩大了自身影响,其中土耳其极力改善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与西方及以色列的关系逐渐疏远。

中东剧变一方面打破了原有格局,另一方面也推动了 2010 年前的一些新趋势的发展。亲西方的埃及穆巴拉克政权和突尼斯本·阿里政权倒台,反对西方的利比亚卡扎菲被杀,敌视西方的叙利亚巴沙尔政权遭受反对派和“伊斯兰国”的围攻;沙特等海合会成员国控制了阿盟作为推进其外交政策的工具,开除了叙利亚的成员资格,并与土耳其合作支持叙利亚反对派,与埃及等国联合进攻也门胡塞武装组织。同时,美国等西方国家支持对叙利亚的制裁、援助叙反对派和库尔德武装,甚至直接对叙利亚进行打击,并就沙特等国对也门胡塞武装组织的进攻提供后勤和情报支援。另外,伊朗连同什叶派的黎巴嫩真主党支援叙利亚政府,扶助胡塞武装组织,对抗沙特、土耳其等逊尼派国家。由此,在中东形成了逊尼派、什叶派两大教派联盟的正式对抗,两者分别得到了西方国家和俄罗斯的倾力相助。在上述两大联盟之外,以色列与海湾国家建立了对付叙利亚和伊朗的秘密联盟,土耳其则逐渐改善了与俄罗斯的关系。在两大联盟之间,迅速崛起的“伊斯兰国”最初是西方和海合会反对叙利亚的助手,后来则因从事恐怖主义活动而成为两者和俄罗斯、土耳其、伊拉克、库尔德武装共同打击的对象。

可见,中东剧变使亲美的中东国家有所减少(埃及的政策趋于中间化,土耳其疏远西方),但整体格局没有大的变化,同时围绕新的热点(叙利亚、“伊斯兰国”、也门)形成两大教派联盟及俄罗斯与西方阵营的对抗,三场内战(叙利亚—伊拉克、也门、利比亚)形成紧绷的形势,整个地区格局更加错综复杂。在新的中东格局中,盟友的概念出现淡化,如美国的盟友土耳其、以色列同沙特与俄罗斯的关系均有改善,而随着 2018 年巴沙尔政权全面巩固、“伊斯兰国”溃败、以色列加紧对叙利亚的军事打击,俄罗斯也通过各种手段促使伊朗从叙利亚撤出其军事力量,以减少以色列的

打击行动。美国在也门形势恶化后撤出了驻扎该地、应对“基地”组织的美军，此后进一步谋划从叙利亚和阿富汗撤军，而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的首都及戈兰高地为以色列领土恶化了其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从而使自身的影响力下降、地区形势更加不稳定。这一时期的另外一个事件是沙特等国与卡塔尔的决裂，它导致了海合会事实上的瘫痪，以及其内部以沙特、阿联酋、巴林为一方，以卡塔尔、科威特、阿曼为另一方的对立，因而使本地区的动荡进一步加剧。

第七，中东剧变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和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

中东剧变造成了发生冲突的阿拉伯国家大批平民及战斗人员的死亡。据估计，吉布提的死亡人数为 2 人，约旦和毛里塔尼亚均为 3 人，阿曼为 2~6 人，摩洛哥为 6 人，阿尔及利亚为 8 人，沙特为 24 人，巴林为 120 人，苏丹为 200 人以上，突尼斯为 338 人，埃及为 846 人，利比亚为 9400~20000 人。^① 而根据叙利亚政策研究中心于 2016 年 2 月发布的数字，在叙利亚内战中直接或间接死亡的总人数达到 47 万人，远远超过联合国于 2014 年 8 月发布的数字（25 万人）。此外，在内战中受伤的人数达到 190 万人，叙利亚的人均寿命从 2010 年的 70 岁下降到 2015 年的 55.4 岁。^② 根据不同来源的统计，在 2014~2017 年，伊拉克有 69372 名平民身亡。^③ “伊斯兰国”占领区和交战区，发现了不少极端分子进行屠杀的万人坑，以及他们在一些军事行动中使用化学武器的痕迹。

下面以也门为例进一步说明剧变造成的人道主义危机的情况。2015 年，也门内战全面爆发，根据国际非政府组织“武装冲突定位和事件数据项目”（Armed Conflict Location & Event Data Project, ACLED）的数据，2016 年初以来，也门内战造成的死亡人数至少达到 57538 人（包括战斗人员和平民）；如果加上 2015 年的 9 个月，总的死亡人数可能在 7 万~8 万人。另外，据“拯救儿童基金会”估计，仅 2017 年因为饥饿而死亡的也门儿童就

① “Arab Spring,” April 2, 2019,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rab_Spring.

② “Report on Syria Conflict Finds 11.5% of Population Killed or Injured,” February 11, 2016,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6/feb/11/report-on-syria-conflict-finds-115-of-population-killed-or-injured>.

③ “Number of Documented Civilian Deaths in the Iraq War since 2003,” February 29, 2020,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269729/documented-civilian-deaths-in-iraq-war-since-2003/>.

有 5 万人。^① 由于内战，也门经济严重衰退。同时，该国对外通道处于海陆空的全面封锁中，国际救援受阻，而该国 90% 的食品来自进口，由此导致了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在当地，据报道每天有 1300 万人遭受饥饿，另有 600 万人因饥饿而奄奄一息。此外，水供应设施遭到严重破坏，水价飞涨，而政府的有关机构彻底瘫痪。2015 年，也门有 2000 万人急需洁净的饮用水和医疗服务。^②

综上所述，中东剧变发生以来，虽然大多数阿拉伯国家的抗议运动早已中止，但真正进行改革的国家并不多。有的国家在政治体制上进行了较大的改革，但经济问题没有明显起色，如突尼斯，倒是回归传统体制的埃及在经济上较为稳定。问题最严重的是三大热点地区，即叙利亚—伊拉克、也门和利比亚，后两个热点地区动荡依旧，叙利亚—伊拉克趋于稳定，但叙利亚距离真正的稳定还有很长的路。沙特在萨勒曼新国王上任以来的政策反复和卡塔尔问题揭示出产油国的内在问题，而阿尔及利亚在 2019 年 2 月以来民众针对现任总统布特弗利卡寻求连任的抗议运动则说明了改革迟滞的危险。因此，中东国家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各领域的问题积重难返，需要有效的应对和高度的政治智慧。

[责任编辑：申玉辉]

① Lee Keath, "Civilian Death Toll in Yemen Mounting despite US Assurances," November 10, 2018, <https://www.apnews.com/24ee4b33373a41d389e2599e5aa7bbfa>.

② "Yemeni Civil War (2015 – present)," April 2, 2019, [https://en.wikipedia.org/wiki/Yemeni_Civil_War_\(2015%E2%80%93present\)](https://en.wikipedia.org/wiki/Yemeni_Civil_War_(2015%E2%80%93present)).